

主编 李天纲  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 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·心理学（第一辑）

Levolution des peuples

# 民族进化的心理定律

〔法〕赖朋(Gustave Le Bon)著 张公表 译述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主编 李天纲  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 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·心理学（第一辑）

Levolution des peuples

# 民族进化的心理定律

[法] 赖朋 (Gustave le Bon) 著 张公表 译述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民族进化的心理定律/李天纲主编. —上海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17

(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. 心理学)

ISBN 978-7-5520-1831-8

I. ①民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民族心理学—研究 IV. ①C9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32144号

## 民族进化的心理定律

---

主 编: 李天纲

编 纂: 赵 炬

责任编辑: 唐云松

特约编辑: 陈宁宁

封面设计: 清 风

策 划: 赵 炬

执 行: 取映文化

加工整理: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

责任校对: 笑 然

出版发行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

电话总机 021-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-53063735

<http://www.sassp.org.cn> E-mail: [sassp@sass.org.cn](mailto:sassp@sass.org.cn)

排 版: 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合作公司

印 刷: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650×900毫米 1/16开

印 张: 13.75

字 数: 180千字

版 次: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---

ISBN 978-7-5520-1831-8/C.126

定价: 76.00元(精装)

---

# 民国西学：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

——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序

李天纲

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，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。来自欧美的『西学』，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，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，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。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，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，激发思想，乃至产生新的理论，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。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，公元九、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，有一场著名的『百年翻译运动』之外，还有欧洲十四、十五世纪从阿拉伯、希腊、希伯来等『东方』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，汇入欧洲文化，史称『文艺复兴』。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『西学』，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，称之为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、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并不过分。

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，其实早有前奏。梁启超（1873-1929）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说：『自明末徐光启、李之藻等广译算学、天文、水利诸书，为欧籍入中国之始。』利玛窦（Matteo Ricci, 1552-1610）、徐光启、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，比清末的『西学』早了二百多年。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：利、徐、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、历算等『科学』著作，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《论灵魂》（《灵言蠡勺》）、《形而上学》（《名理探》）等神学、哲学著作。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『西学东渐』之始是对的，但他说其『范围亦限于天（文）、（历）算』，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，直到今天。

从明末到清末的『西学』翻译只是开始，而且断断续续，并不连贯成为一场『运动』。各种原因导致了『西学』的挫折：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；受清初『中国礼仪之争』的影响；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，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。鸦片战争以后很久，再次翻译『西学』，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。从翻译规模来看，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、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，影响力却仍然有限。梁启超说：『惟（上海江南）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，李善兰、华蘅芳、赵仲涵等任笔受。其人皆学有根底，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，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、李。』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，但说『戊戌变法』之前的『西学』翻译只在上海、香港、澳门等地零散从事，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，则是事实。

对明末和清末的『西学』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：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，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『西学』，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『翻译运动』。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，数以千计的『汉译名著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。1905年，清朝废除了科举制，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『大学堂』的方式举行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『书院』系统改造而成。新建的大学、中学，数理化、文史哲、政法等等学科，都采用了翻译作品，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，于是，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，即在『四书五经』之外，还必须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『西方经典』，甚至到了『言必称希腊、罗马』的程度。

我们在这里说『民国西学』，它的规模超过明末、清末；它的影响遍及沿海、内地；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，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、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，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，但从一般直觉来看，是可以成立的。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，以及『现代化』、『世俗化』、『理性化』，都与『民国西学』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。然而，『民国西学』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？它是一

个怎样的体系？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？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，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。还有，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，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？「西学东渐」的代表，明末有徐光启，清末有严复，那「民国西学」的代表作在哪里？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，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，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、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的「西学」著作，束之高阁，已经好多年。

举例来说，1935年，上海生活书店编辑《全国总书目》、「网罗全国新书店、学术机关、文化团体、图书馆、政府机关、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」。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，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，分为：「总类、哲学、社会科学、宗教、自然科学、文艺、语文学、史地、技术知识」。一瞥之下，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「人大图书分类法」更仔细，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、学说、学科、流派更庞大。尽管并没有统一的「社科规划」和「文化战略」，「民国西学」却在「中国的文艺复兴」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。查看《全国总书目》（上海，生活书店，1935），在「社会科学·社会学一般·社会主义」的子目录下，列有「社会主义概论、社会主义史、科学的社会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基尔特社会主义、乌托邦社会主义、基督教社会主义、议会派社会主义」等；在「社会科学·政治·政体体制」的子目录下，列有「政治制度概论、政治制度史、宪政、民主制、独裁制、联邦制、各种政制评述、各国政制、中国政制、现代政制、中国政制史」等，翻译、研究和出版，真的是与欧美接榫，与世界同步。1911年以后的38年的「民国西学」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，而我们却长期忽视，不作接续。

编辑出版一套「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」，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著作重新刊印，对于我们估计、认识和研究「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」、「中国的文艺复兴」，接续当

时学统，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。1980年代初，上海、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、庞朴先生为代表，编辑『中国文化史丛书』，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『中国文化史丛书』，重振旗鼓，『整理国故』，先是恢复，然后才谈得上超越。遗憾的是，最近三十年的『西学』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『接续』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，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，诸如控制论、信息论、系统论……还有『老三论』、『新三论』、『后现代』、『后殖民』等等新理论，对『民国西学』弃之如敝屣，避之唯恐不及。

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，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，单靠『严译八种』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，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，几份报刊的主笔。但是，像王造时（1903-1971）先生那样在『西学』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，然后借此『西学』，主编报刊、杂志，在『反独裁』、『争民主』和『抗战救国』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。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《历史哲学》、摩瓦特的《近代欧洲外交史》、《现代欧洲外交史》、拉铁耐的《美国外交政策史》、拉斯基的《国家的理论与实际》、《民主政治在危机中》。1931年，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，文学院院长，政治系主任，后来创办了《主张与批评》（1932）、《自由言论》（1933），组织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』（1932）。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、法治、理性的自由主义，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、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（见王造时著《荒谬集·我们的根本主张》，1935，上海，自由言论社）。非常可惜的是，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、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，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，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，读不到，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。

我们说，『民国西学』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，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『断裂』之后，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，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，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。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，我

们都没有再去翻看，认真比较，仔细理解。「改革、开放」以后，又一次「西学东渐」，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「西学」，用新的取代旧的，从尼采、弗洛伊德……到福柯、德里达……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：「熊瞎子掰包谷，掰一个丢一个。」中国学者在「西学」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，在层出不穷的「西学」面前特别害怕落伍。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：更新的理论，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，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，或者借用，来解决中国的问题。这种实用主义的「西学观」，其实是一种懒惰、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，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。

讨论二十世纪的「西学」，一般是以五四「新青年」来代表，这其实相当偏颇。胡适、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「西学」，倡导「启蒙」时居功至伟，但是「新文化运动」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，也使得这一派的「西学」浅尝辄止，比较肤浅，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「民国西学」。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有一个宗旨是要「输入学理」，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知识，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，说「我们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便曾经发行过一期「易卜生专号」，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，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《易卜生主义》。《新青年》也曾出过一期「马克思专号」。另一个《新教育月刊》也曾出过一期「杜威专号」。至于对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、日耳曼意识形态、盎格鲁·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，也就习以为常了。」（唐德刚编译：《胡适口述自传》，北京，华文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191页）。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，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「真理」的轨迹。三四十年间，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，到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马克思主义；从不列颠宪政学说，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、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，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，大致就是「输入学理」运动中的全部「西学」。

胡适一语道破地说：「这些新观念、新理论之输入，基本上为的是帮助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



问题。」胡适并不认为这种「活学活用」、「急用先学」的做法有什么不妥。相反，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「西学」的方法论，大多认为翻译为了「救国」，如同进口最新版本の克虏伯大炮能打赢仗，这就是「天经地义」。今天看来，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「实用主义」，是生吞活剥，不加消化，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，或曰：是「夺他人之酒杯，浇自己之块垒」。从我们收集整理「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」的情况来看，「民国西学」是一个比北大「启蒙西学」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认为「五四运动」及其启蒙大众的「西学」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，在北大的「启蒙西学」之外，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「民国西学」。或许我们应该把「启蒙西学」纳入「民国西学」体系，「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」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。

我们认为：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，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，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，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，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。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，不中不西，并非简单的外来「冲击」所致，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。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、立场、方案、主张、主义……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，但都要在理解、消化、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，才会有更好的发挥。在这一方面，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，那便是「欲求超胜，必须会通；会通之前，必先翻译」。反过来说，「翻译」的目的，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，而非搬用；「会通」的目的，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，而是一种创新——「超胜」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。二十世纪的「民国西学」，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，值得我们捡起来，重头到底地仔细阅读，好好思考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「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」，献弁言于此，是为序。

[法] 賴朋 (Gustave Bon) 著 張公表 譯述

# 民族進化的心理定律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初版

## 何序

賴朋所著「民族進化的心理定律」據作者自己說是其文化史著作之一簡短撮要，我們由此可以看出賴朋是個唯心派的代表。他的長處，就是能將他的哲理建築於一部分客觀事實上同一種科學原理上，所以他的學說有幾條頗能成立，例如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（五）等條是也。（見張序）（六）（七）（九）等條只有一部分能成立，餘則頗有偏見。我們既在介紹賴朋學說，便無須逐條批評；但對於其可滋誤會之處，不能不加以說明同辯駁，尤其譯者介紹此書之苦心何在，更不能不為讀者指出。我們民族自有歷史以來隨時都在同異族接觸，但結果漢族不是同化了他族就是自己復興；只有同西洋民族接觸以後，我們民族便一天不如一天的墮落下去。到了現在，四千餘年來歷史上所無的奇恥大辱，都堆滿了我們面上，一方面我們革新運動，並不會一日停頓，我們正尋不出原因去解釋這種失敗。見着賴朋的學說如像各民族生活是被少數不變的心理

上因子所支配，又如像各種族之心理特性極相差異，他們對同一外來之影響而卻各不相同的印入，又如像一民族文化之各要素，只不過是其心理組織之外部表現。此民族所特有的某種感覺與思想之方式，不能轉授與心理組織不同之民族，而不變遷等未嘗不恍然大悟。我們的失敗，是過於在形式上模仿，而根本精神上未曾容納用著作的話，就是我們的新心理組織尚未形成，就不能接受新文化。譯者的苦心就在此，我們從他的序裏面便看得出如云：「國人心理上之最大錯誤即將國家命運希望於僥倖的偶然現象，或外部環境，尤特別存一種依賴政治制度之心，而不注意於民德民智之增進」云云。又如云「時至今日，國難愈深，國土愈削，吾國家社會再不能作任何主義任何制度之盲目的淺薄的試驗場了，吾人今日惟一希望安寧與休養，只主張作工與生產，緩緩的將西方民族的心理組織，將西方文化之根本的真精神轉移過來，才是吾國家民族惟一之出路」云云，這便是譯者的忠實表示，也就是他的苦心所在。據我看來，賴朋的學說，從靜的方面解釋，可以滿意，但從動的方面解釋，尙嫌不足，我們拿日本維新同中國變法來比較，日本可以算是成功，中國算是失敗。日本種族中國種族同屬東方，同趨歐化，而結果兩樣。在賴朋學說，只可說日本中國兩民

族有不同之心理組織，故對同一外來影響，卻不相同的印入；但日本何以立即形成新心理組織，照作者之意這是很慢的，便成一個疑問了。我的解釋是動的，我認爲歷史上的興亡盛衰是相循環的，或許將來可以保持一種永久向上的演進；但自有史到現在盛衰實是一種波動式的。日本是在由衰而盛時與歐洲文化接觸，故能成功。換句話說，波動正向上，又加一種助力，故愈向上。中國是由盛而衰時與歐洲文化接觸，故反壞事。歐化既未成功，我們民族的弱點，反暴露無餘了。換句話說，波動正向下，加了一種力，一時或可停止其向下趨勢，如未能將其趨勢轉而向上，則停止一時，依然趨於向下，所以愈弄愈壞也。我們了解這個道理，使用不着慢慢的等新心理組織之形成，只要全體一心將向下波動轉而向上，便是民族光明出路。第一我們不能把自己視作例外；第二我們要把消極態度變爲積極；第三我們要變怯懦爲勇敢；第四我們要舍私爲公；第五我們要努力科學化；或許我們自己雖未視作例外，而他人自視作例外的太多了。或許我們態度雖積極，事體還是一樣做不動；或許我們舍私爲公反受了損害，種種困難改變不了我們向上的趨勢，這才算真覺悟。我們事到今日，難道連這種志願都不肯發麼？我想必定不會如此。我最反對「莫辦法」一句話，古今中外數千

年歷史，以及現代學術進步，可供參攷方法何止千萬，豈有偌大中華民族而莫辦法的道理！今人敢於作惡，全由於墮落心理，作者所謂少數不變的心理上因子支配民族生活是也。賴朋學理最易滋誤會的就是：

(六)文化之不可避免之結果在使各個人間與各種族間之差異，所以各民族并不趨於平等而趨於逐漸懸殊之不平等。

還有一點：賴朋將種族分爲四等，1. 原始種族，2. 下等種族，3. 中等種族，4. 高等種族。

不惟低一等的種族很難自動接受高一等種族的文化，而且高等種族也不能將其文化傳之低等種族。又說由聰明來的發明，是人類公有恆產；而品性之優劣則爲每個民族獨有之恆產。所以一民族之品性，而非其聰明，實定其歷史上之演進，而掌執其命運。又說仍由於品性，故六萬之英人能將貳萬五千萬印度人束縛住云云。

譯者說上列各原則給予平等主義者，國際主義者，大同主義者，一極大打擊云云；這便是作者所引起誤解，甚至就是作者自身的誤解。至於種族等級之區分，正是高等種族自己暴露其弱點，他

們要是把殖民地的人民當成本國的人民待遇時，怎見得低一等種族不會接受他們的文化！我說作者自身也有誤解，原因是研究文化史，斷不可忽略經濟，尤不可忽略科學進步。個人與個人的爭奪，國家與國家的爭奪，民族與民族的爭奪，都是經濟條件在那裏驅使。每至人口膨脹時，或經濟衝突時，總有相當戰爭恐慌。百年以前，都惴惴然怕物質不能供給人類，故強者總先爲自己打算，或是剝奪弱者或是消滅弱者，這種心理組織還在那裏支配許多優秀民族，實際上今日的科學進步，已證明物質能供給全人類。我們應該整個計算，當然要立於人皆平等的原則上，（水平線上智識同生活）如何利用人力，去開發物力，去建一個和平光明的世界。爲甚麼要畫出國界，階級，及種族呢？我們絕對不反對智識高的指揮智識低的，或者教導他，但我們反對任何壓迫！末了作者主張混合種族，實在是一種遠大眼光，但我們首先當從改良種族做起，我們的大人先生們，只要肯舉眼一看，便知道我這句話的重要和迫切了。我很感謝張君引起了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同和繼續研究的問題，所以我很誠懇的用批評方式來介紹這一部大著作於國人之前，絕不會減小作者的本身價值，或許對於思想界到引起一種注意，那便不辜負張君的勤苦。

二十三年仲夏何魯序於學海室。



## 譯者序

賴朋 (Guillaume Le Bon) 先生乃法國現代一大科學家，大哲學家與大著作家。作品豐富，思想深刻，特選其書之一譯之以介紹於國人。本書所論範圍乃關於歷史哲學，文化變遷等問題。作者在其緒論與書末之總結論中曾經說過，此乃他對文化史著作之一簡短撮要，一種綜合。在他的緒論中，他曾將本書的主要意義與研究之各點逐一敘述過，在書末的總結論中他又將全書研究的結果，如數學之定理一般，逐一列為若干原則；故讀者極易領會其思想之真義。書中有幾種值得注意的觀念：

(一) 認為各民族之生活是被少數不變的心理上之因子所支配。

(二) 認為各種族之心理特性極相差異，他們對同一外來之影響而卻各不相同的印人。其常生出之結果即一種絕對的與互相的不了解，此種不了解特別在交通迅速使各民族易於接